

● 文学研究

战争与爱情的澳式书写^{* 1}

——解读理查德·弗拉纳根长篇小说《曲径通北》

徐阳子 彭青龙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提 要:《曲径通北》是一部有关澳大利亚二战记忆的小说,书中所述澳军战俘被日军奴役修建泰缅铁路的经历堪称澳大利亚历史中最残忍的章节之一。本文认为,理查德·弗拉纳根抓住澳大利亚民族记忆的核心,以战争与爱情为主题,深刻透析生命个体在生死存亡状态下的人性抉择,拷问游离于灵与肉、善与恶和爱与恨之间的复杂人性,表达出作家谴责暴力与战争、向往爱情与和平的诉求及人文情怀。

关键词: 理查德·弗拉纳根 《曲径通北》; 战争; 爱情; 人性

中图分类号: I1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7)02-0115-6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7.02.019

The Australian Writing of War and Love

— A Study on Richard Flanagan's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Xu Yang-zi Peng Qing-lo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ustralian prisoners of war captured by the Japanese in the WWII are central figures in Australian national memory. Richard Flanagan's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depicts the experience of Australian prisoners who were forced to construct the Thai-Burma railway,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brutal chapters in Australian histo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lanagan attempts to build his narrative around the dual themes of war and love, and thoroughly depicts the complex humanity that hovers between soul and body, good and evil, and love and hate. Flanagan's resentment against violence and war, as well as his sincere desire for love and peace is well-expressed in the novel.

Key words: Richard Flanagan;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war; love; humanity

1 引言

从 1914 年至 1945 年,澳大利亚先后两次卷入世界大战,其民族性格也在战火洗礼中得到升华。一战一直影响着 20 世纪澳大利亚人的战争记忆,期间诞生的“澳新军团神话”在国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澳新军团所展现的勇敢、幽默、顽强、男子气概、伙伴情谊和平等主义等英雄品质成为澳大利亚民族精神的象征(Beaumont 2005: 191)。但是,澳新军团的不朽形象很快就在

二战中轰然倒塌,尤其是“澳新军团之子”被“亚洲敌人”奴役并虐待的惨痛经历给澳大利亚固守的种族等级划分、男性身份认同以及民族战争神话等价值观带来极大的挑战,并因此成为澳大利亚二战记忆中的核心意象(Twomey 2014: 192),其中经久不衰的 3 大标志是新加坡樟宜战俘营、泰缅铁路以及爱德华·邓洛普(Hearder 2007)。理查德·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的布克奖作品《曲径通北》(*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16ZDA200)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澳大利亚现代文学批评史”(12BWW037)的阶段性成果。

North)就是以民族英雄爱德华·邓洛普为原型,讲述二战期间澳军战俘被日军奴役修建泰缅铁路的故事。弗拉纳根也由此成为继托马斯·基尼利、彼得·凯里和D. B. C. 皮埃尔之后,澳大利亚第四位获得布克奖的作家,被评论界视为当代澳大利亚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在这部作品中,作家通过对战争与爱情两大主题的悲剧叙述,深刻透析生命个体面对灾难所做出的人性抉择,借此拷问游离于灵与肉、善与恶、爱与恨之间的复杂人性。《金融时报》不吝溢美之词,赞誉获奖作品“笔触优雅,文风稳健,不愧为一部杰作”(Rose 2014)。本文以战争、爱情与人性为主线,解读作家对人性劫难及战争本质的探究与反思。

2 残酷的战争书写

《曲径通北》堪称一部出自世界一流作家之手的经典战争小说(Charles 2014)。故事的主人公多里戈·埃文斯出生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一个偏远村庄,墨尔本大学医学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二战爆发后,他到欧洲参战并担任军医,1943年在爪哇岛被日军俘获,被迫与其他上万名盟军俘虏一起为日军修建泰缅铁路。多里戈在日军战俘营中担任千余名澳大利亚战俘的指挥官兼医务人员,他历经生死考验,竭尽全力地救死扶伤。战后归国的多里戈已垂垂老矣,他在“战斗英雄”的光环与伤痛的折磨下度过余生。

影响澳大利亚二战记忆的泰缅铁路是这部作品的核心意象。为了切断盟军的军需补给线并经由缅甸夺取印度,日本总部于1942年末下令修建泰缅铁路,所需劳力全部由战俘及所占领国家的劳工充当,其中就有9000名澳大利亚战俘(Flanagan 2014a: 24-25)。战俘和劳工们不仅要在恶劣的环境下劳动,还要遭受日军毫无人性的身体折磨和精神摧残。这条全长415公里的铁路不到一年便告完工,根据英国官方的统计,在铁路修建过程中死亡的盟军战俘共计18000人,占战俘总数的30%,简直可以称作“一段枕木、一个冤魂”的“死亡铁路”(塞克 2014: 7)。历史学家琼·博蒙特认为,澳大利亚人在亚洲的被俘经历是“澳大利亚最具创伤的民族体验之一”(Beaumont 1988: 2)。以这条臭名昭著的“死亡铁路”为素材,出现过一批反映战争暴行的文艺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由法国作家彼埃尔·布尔的同名小说改编、大卫·利恩执导的奥斯卡获奖影片《桂河大桥》。不少退伍老兵组织批评布尔的小说缺乏历史真实性,并指责好莱坞对人类暴行的美化令

人难以容忍(Donovan 2015: 413)。弗拉纳根的《曲径通北》与《桂河大桥》颇具浪漫色彩的英雄史诗形成强烈反差,将读者带入历史深处最黑暗的地方,可以说是对历史的还原与修正。

弗拉纳根在作品中细致描述战俘在“死亡铁路”上遭受的奴役、饥饿、疾病和暴行,将战争的残酷写到极致。这群“赤身裸体的奴隶”每天要在潮湿闷热的丛林中工作15个小时以上,除了凿子和铲子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工具,只能手挖肩挑地开山劈林、铺设铁轨。在如此非人地超强度劳役下,战俘们还要忍饥挨饿,每天的饮食只有一个发霉的饭团和一小碗稀汤;与严重营养不良如影随形的是蔓延的热带疾病,还有营地看守肆意地毒打与酷刑。死亡人数逐日递增,“这里不再有健康的人,只有病人、严重的病人以及死人”(Flanagan 2014a: 51)。书中有一幕多里戈为战友截肢的场面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甚至有评论认为作家描写得过于细致和血腥。一个澳军战俘的截肢残端不幸感染化脓,多里戈唯一的选择就是从臀部再次截肢。他用自己的皮带作为止血带,用火把照亮腐烂的残肢,用铁勺舀出一股股脓水,接着锯断骨头,再用猪大肠做成的“绳子”将股动脉缝合。不幸的是,伤口缝合处没过多久便出现崩裂,伴随着战俘撕心裂肺的惨叫,鲜血如同喷泉一般蔓延过竹子搭建的简易手术台,流淌到下边深及脚踝的烂泥地上——这就是战争。

然而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痛苦折磨的终结,它还给亲历者带来无尽的心理创伤。弗拉纳根笔下的亲历者包括以多里戈为代表的澳军战俘以及以中村为代表的日军军官,他们在战后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创伤症候。战后归国的多里戈被塑造成“战争英雄、声誉卓著的外科医生、苦难时代的代言人”(同上: 16),但饱受创伤的他却难以适应英雄光环下的平民生活。战时的经历令他难以释怀,俗世的浮名对他毫无意义,他如同内心燃尽的躯壳,疯狂地追求肉体的享乐,并肆意用言语及冷漠伤害妻子,自己的内心也经受极大的痛苦与折磨。与多里戈一同退伍还乡的澳大利亚战俘也大都无法适应战后的新生活,深受战争重创的他们都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典型症状:他们离奇地死于车祸、自杀及各种疾病;婚姻往往难以维持,充满暴力或冷漠;孩子大多生下来便有残疾、弱智等身体缺陷;他们夜以继日地用酒精麻醉自己,或者一言不发,或者滔滔不绝。他们认为自己不是“战争英雄”,而是“黄种人的奴隶”(同上: 340)。日军军官中村上校作为施暴者,同时也是

战争的受害者。日本投降后中村被列为B级战犯,东躲西藏地逃避追捕。战时的阴霾逐渐消散,随着最后一批战犯的获释,中村终于可以卸去伪装,过上正常人的简单生活,好像战争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其实他这种压抑与逃避的态度恰恰是“创伤对生活无尽影响的证明”(Caruth 1996: 7)。中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出札幌冰雪节上的冰雕怪兽,他仿佛看见自己就是恶魔的化身,他在怪兽幻影的折磨下痛苦不堪,直到生命的尽头。通过对澳军战俘以及日军军官所受战争创伤的描写,弗拉纳根立体地呈现出战争创伤的多重维度,促使读者认识到战争的残酷与荒谬,进而思考创伤性事件中个人与集体的责任。

弗拉纳根创作本书的灵感源自父亲阿奇·弗拉纳根的真实经历。阿奇是二战时的一名澳大利亚士兵,在爪哇岛被日军俘虏并沦为奴工,后来成为传奇的“邓洛普千人团”中的一员,由爱德华·邓洛普中校带领,被迫参与修建泰缅铁路。小说的扉页上赫然写着“献给囚犯335号”,就是阿奇在“死亡铁路”上作奴工时的编号。为了创作这部作品,弗拉纳根与父亲进行过无数次“采访式”的交谈,还专门到泰国扛起石头沿着“死亡铁路”行走,试图体验战俘们遭受过的苦役;他去日本采访数位曾在那条铁路上工作的战俘营看守,甚至要求对方反复扇自己耳光,以体验日军中流行的“耳光教育”给战俘带来的羞辱与折磨,弗拉纳根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悲剧。这部历时12年、期间5次易稿的小说是弗拉纳根给父亲的一份献礼,而父亲也在他书稿完成的当天溘然长逝(Flanagan 2014b: 2)。布克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安东尼·格雷林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指出,弗拉纳根将这部作品的背景设定在二战时期,但作品反映的深刻主题在当代同样能引起强烈共鸣“通过影视作品及报告文学,我们现在更加意识到经历战争的人所遭受的创伤。这种描述是永恒的,它不仅是书写二战,而且是书写所有战争,以及战争对人类产生的深远影响”(Brown 2014)。

3 悲戚的爱情叙述

战争与爱情是文学创作中的永恒主题,纵观世界上伟大的战争文学作品,不难看出战争与爱情紧密结合的古老传统,如海明威的经典反战作品《永别了,武器》、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获奖作品《日瓦戈医生》、施林克的战后德国反思作品《朗读者》以及麦克尤恩思考尊严、罪恶与救赎的

《赎罪》等。约翰·杰克斯在小说《爱情与战争》的扉页上引用过拉迪亚德·基普林的名言,“世上两件事最为崇高,一是爱情,二是战争”(杰克斯 1991),而战争与爱情也是弗拉纳根这部重要作品的主线与灵魂。作家通过设置一系列有关战争与爱情的巧合与冲突,呈现在战争与爱情并行交错中被战争摧毁的一个爱情悲剧。

战争既造就爱情又毁灭爱情,弗拉纳根通过对主人公爱情悲剧的叙述突显战争毁灭生活的残酷本质。1940年末,尚未奔赴缅甸战场的多里戈在阿德莱德驻军,在一家旧书店遇到体态娇小、金发碧眼、头戴一朵鲜红茶花的艾米,两人顿时产生一种“神奇的磁力”(Flanagan 2014a: 76)。不久之后,多里戈发现这位令他朝思暮想的女子竟是他叔叔的妻子,但这一事实并未阻止二人不可自拔地坠入情网。东窗事发后,多里戈当即决定带艾米远走高飞,却突然接到部队紧急出发的指令,他万万没想到此次一别竟是一生。分隔异地的两人用书信寄托彼此的思念,艾米的爱伴随着多里戈挨过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但两人美好的爱情在战争的血与火中注定要以悲剧收场。多里戈在缅甸被俘后不久便音讯全无,艾米的丈夫趁机谎称多里戈已经死在战俘营里;与此同时,多里戈的妻子艾拉也在信中谎称艾米死于一场瓦斯爆炸。作家精心设置的巧合于多年之后两人在悉尼海港大桥上的偶遇达到高潮:多里戈在海港大桥上遇到令他魂牵梦萦的艾米,正当他百感交集、犹豫不决之时,艾米已经与他擦肩而过,很快混入人群中消失不见。其实,战后归来的多里戈步入公众视野后,艾米曾多次想主动与他联系,无奈她身患癌症,多里戈却“前途大好”,于是艾米心想“只要知道他还活着就够了”(同上: 431)。战争使人分离,使爱情难以维系;战争带来死亡,使爱情彻底终结。

弗拉纳根在小说的末尾借用海明威著名的“冰山原则”为战争与爱情画上沉重的句点。“冰山原则”就是用简洁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把自己的感受、思想与情绪最大限度地埋藏在形象之中,使情感充沛却含而不露,思想深沉却隐而不晦,从而将文学的可感性与可思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通过鲜明形象的感受去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张晓花 2009: 108)。尾声部分以闪回的形式完成,作家把场景重新切换到多里戈收到家书得知艾米死讯的一幕:痛不欲生的多里戈在恍惚之间仿佛看到“泥泞的小路旁,无尽的黑暗中,一朵鲜红的茶花正在盛开。他打着油灯弯下

腰来端详这‘小小的奇迹’,然后起身在暴雨中站立良久,接着挺直腰身,继续前行”(Flanagan 2014a: 466)。“红茶花”这一意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它是女主人公艾米的象征,也是美好爱情的象征。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弗拉纳根虽然没有正面描写主人公内心的悲恸,也没有过分地渲染场景,但读者却能感到那股强烈而深沉的感情潜流。文字塑造形象、形象包含情感、情感蕴藏思想,作家运用含蓄、凝练的象征手法,把作品的主题思想高度抽象化,极大地扩展语言的张力。《曲径通北》中战争与爱情的紧密交织有力地表达出小说的反战主题,也成就这部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弗拉纳根的故事之所以令人屏息凝神,不只是因为硝烟中的爱情使人沉醉,美丽中的缺憾使人扼腕,更重要的是生命中爱的永恒使人心驰神往。小说从始至终紧扣爱情主题,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相遇、相爱和相别,把炽烈的爱情、恼人的离情和无限惋惜的伤情共冶一炉。战争是残酷的,爱情是美好的,战争与爱情在作品中相互碰撞产生的巨大合力令人震撼:没有战争作为背景和主题,不足以使小说表现深刻;没有爱情加以推动及深化,不足以使主题发人深省。“每一个场景都可以作为故事的引导线索和主要情节。通过串联所有这些场景和阅读主人公在每一个场景里的行动和思想,读者可以在脑海中搭建起一个立体图画空间。”(陈亚美 2015: 151)正如格雷林所说,“文学的两大主题是爱情与战争,《曲径通北》就是一部讲述爱情与战争的宏伟巨著。弗拉纳根文体雅致、行文雄辩,他用一个兼具罪恶与英雄色彩的故事,在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实之间搭起一座桥梁”(Masters 2014)。

小说中与爱情强大的救赎功能并驾齐驱的是诗歌艺术的独特魅力。具体来说,弗拉纳根通过对日本高雅文学形式的借鉴,创造性地介入悲剧性历史事件,在尊重历史真相以及用诗意的方式虚构故事之间保持一种巧妙的张力。小说的题目取自日本文坛一代宗师松尾芭蕉的纪行作品《奥之细道》的英文译名(*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书中记录芭蕉长达5个月、行程2,350公里的一次徒步深入日本腹地、充满危险与孤独的旅程,堪称古代日本纪行文学的巅峰之作(松尾芭蕉 2008: 5-6)。日本民族将万物视作“灵物”,因此他们有崇敬自然的深层文化心理和与自然物亲近、交流的思维特点(张锦 2016: 173),为此,芭蕉此行多被学者解读为通往“死亡”及“永生”的精神之旅(Collett 2013: 251),可以说与《曲径通

北》中不同人物的“死亡”及“永生”之旅形成互文。除此之外,小说中多个主要人物都与诗歌有着不解之缘。主人公多里戈热爱诗歌,他最喜欢的诗歌是丁尼生的《尤利西斯》,其中“我决心/驶向太阳沉没的彼方,超越西方星斗的浴场,至死方止”(Flanagan 2014a: 461)的诗句可谓多里戈一生的写照。诗歌对日本军官来说同样意义重大。杀人如麻的中村和宏大都热衷于日本传统文学,尤其喜爱芭蕉的《奥之细道》。在他们眼中,这首诗是“日本之魂”的精髓所在,“死亡铁路”便是“日本之魂”的化身,他们正是“通过这条‘通往北方的曲径’,把芭蕉的智慧传递到更广阔的世界”(同上: 130)。在弗拉纳根眼中,这承载着“日本之魂”的芭蕉诗句充斥着强烈的反讽意味。他在解释以《奥之细道》作为书名的初衷时表示,“如果芭蕉的《奥之细道》被公认为日本文化的最高点,那么我父亲的经历则代表日本文化的最低点”(Flanagan 2014b)。在日本文学中备受尊崇的作品象征着日本的智慧与灵魂,而死亡铁路上数不清的战俘亡魂则暴露出日本文化特有的野蛮与残忍。弗拉纳根对日本高雅文学形式的诗意运用与日本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相互交织并形成对比,这是人类最高智慧与最大丑恶之间相融相悖的绝佳体现。

4 深度的人性拷问

弗拉纳根表面上书写战争与爱情,但实际上“人”才是其探究的根本主题。作家在小说中塑造3类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反英雄式”的矛盾体人物多里戈、珍视伙伴情谊却人性异化的澳大利亚战俘以及在“人”与“兽”之间苦苦挣扎的日军军官,尝试在深层次拷问游离于灵与肉、善与恶、爱与恨之间的复杂人性。作家想告诉人们,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才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灾难。

弗拉纳根在小说中摒弃传统战争文学中的英雄主义描写,没有把多里戈塑造成十全十美的英雄,而是一个复杂且痛苦的“反英雄”矛盾体。多里戈生性懦弱、逆来顺受、风流成性,在生活中算不上一个好男人、好丈夫,但他在战俘营里却善良坚韧、勇于抗争。他积极为同伴们争取食物及药品,竭尽全力地救死扶伤。多里戈每天都要与日军看守就当日的出工人数据理力争,这是他最害怕面对的事,因为如果他按要求如数挑出战俘,就等于亲手把他们送上死路;可如果他拒绝,日军看守就会随意挑选那些病情最重的战俘,他们同样是死路一条。正是在与强大敌人的奋勇抗争中,他

的生命意义才获得佐证与升华,他被战俘们亲切地称作“大哥”(Flanagan 2014a: 466)。伙伴们的期望使多里戈深感责任重大,这种压迫感甚至令他窒息。他仿佛看到“两个自己”:伙伴口中的“大哥”乐于自我牺牲,而他“只是个自私的凡人,在绝望中求生而已”(同上: 50)。澳大利亚文学向来重视极度男性化的硬汉形象,弗拉纳根似乎有意弱化澳大利亚人身上的阳刚之气,在他的笔下,杰出的品质与固有的人性弱点同时存在,充分显示出弗拉纳根把控人性的能力。

弗拉纳根对澳大利亚战俘的刻画同样力求探索多面的人性,并着意展现人性中的善恶交融以及战争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在战俘营这样的人间炼狱中,战俘们相互扶持,甚至苦中作乐,举办音乐会。当战俘们合唱起电影《魂断蓝桥》的主题曲《友谊地久天长》时,澳大利亚人所珍视的那种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的“伙伴情谊”油然而生。他们明白,“勇气、生存与爱并非存在某一个人心中,而是存在每个人心中;其中一人一旦死去,这些精神支柱也会随之消逝。因此他们相信,抛弃任何一个人就是抛弃他们自己”(同上: 195)。战俘们试图藉由其特有的澳大利亚咒骂、澳大利亚记忆及澳大利亚伙伴情谊来支撑自己,但“澳大利亚”这几个字相对于饥饿、疾病、酷刑、奴役及死亡而言,竟然变得一文不值。与此同时,这群澳大利亚战俘也远非圣人,战争扭曲并践踏他们的“人性”,放大且纵容他们的“兽性”。小说中有这样一幕:坚强乐观的“黑小子”加德纳被冤枉消极怠工而被3名看守轮番殴打,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被迫围成一圈观看的伙伴却对加德纳撕心裂肺的呼救充耳不闻,眼睁睁地看着朝夕相处的战友被敌人摧残。有些人用幻想着与家人共度圣诞的温馨场面来转移注意力,更有甚者竟然在心底抱怨何时才能结束毒打以便吃上晚饭,“此刻这群男人已不再是男人,这些人已不配为人”(同上: 298)。人在死亡威胁下展示出赤裸裸的动物本能,以野兽般的冷漠来最大限度地延长随时可能终结的生命。写到此处作家不禁发出感慨“暴行才是唯一的真理……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暴行史”(同上: 307)。当天深夜,战俘们发现加德纳淹死在营地的茅坑里,他的生命在这里停止,战争带来的绝望令人无法逾越。

弗拉纳根在小说中对日军军官复杂人性的刻画尤其令人称道。无论日本军人的战争行径多么残忍、暴虐,作家并没有简单地将他们描绘成彻头彻尾的恶棍,而是把他们刻画成有血有肉、善恶并

存的普通人,并深入挖掘这群施暴者由“人”变“兽”背后的政治、历史、信仰等因素。小说着墨最多的是负责管理战俘营的中村少校,他坚定不移地奉行日本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相信“进步不需要自由”(同上: 77);同时被灌输扭曲的战俘观,认为“战俘是没有羞耻、没有荣誉可言的人,战俘不是人”(同上: 330)。在中村管理下的战俘营简直就是一个活人屠宰场,但讽刺的是中村内心其实不乏疑惑,他并不理解“日本之魂”和“自由”到底是什么,一心只想着铁路、荣誉和天皇,并自认为是一位正直且光荣的军官。他需要在兴奋剂的刺激下才能执行任务,每当绝望之时,文学素养颇高的他会在诗歌中找寻意义。战后的中村展现出温情的一面,他热爱家庭,为人谦和,甚至发现自己竟然是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同上: 399)。弗拉纳根用很大篇幅来揭示中村内心痛苦的挣扎与折磨:他试图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忠诚履行帝国责任的高洁之人,试图为曾经的残暴行径找出看似高尚的借口,但又隐约感到曾经坚信不疑的真理也许都是错误的,他心目中美丽高尚的帝国与天皇此刻变为恐惧、恶魔及漫山遍野的尸体(同上: 407)。中村临死前创作的诗句,“冬日的冰雪/融化在纯净的水中/纯净一如我心”便是他对纯净心灵及世界的向往(同上: 412)。格雷林在为弗拉纳根颁奖时指出,这部小说给评委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其试图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即日本人和澳大利亚人一样,都是战争的受害者,而这种能够看到事物两面性的能力就是伟大文学作品的标志之一(Romei 2014)。

弗拉纳根对复杂人性的多维透视及精湛把握是通过其复杂且独特的叙事技巧来体现的,即时间倒错与多重视角的叙事手法。根据现代叙事学的观点,现代性的叙事文本都具有双重时间性质,即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其中故事时间带有物理性质,故不可更改,话语时间显然可塑性大,热奈特将“这两个时间顺序之间一切不协调的形式”称为“时间倒错”(热奈特 1990: 17)。在弗拉纳根的小说里,正常的叙事顺序在话语时间的编排中得到重新定位:故事开端是多里戈一两岁时在一座木质教堂中的场景,随后突然切换到多里戈77岁时以“战争英雄”的身份回顾一生,然后又往回跳转大约50年来到多里戈在战俘营的苦难岁月,叙事的时间轴跟随主人公回忆的循环往复而曲折前行。时间的倒错使故事情节交叉糅合,吸引读者从错综复杂的时间安排里寻觅情节的踪影,从而获得一种愉悦的阅读期待。除利用“时

间倒错”的技巧在多里戈一生的不同阶段之间来回跳转,弗拉纳根还尝试通过多重视角的表述张力来全方位地表达主题。随着故事的推进,弗拉纳根不时离开多里戈的视角,转而进入澳大利亚战俘、日军军官、战俘营韩裔看守等其他人物的思想。这种多重视角的切换方式有助于作家展现不同人物的观点,从而重新建构并还原历史真相,同时也使读者不断变换视角进行思考,极大地增添作品主题的深刻性及复杂性。托马斯·肯尼利在为《卫报》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称赞弗拉纳根对时间倒错和多重视角的运用“大胆且成功”,而且由于小说如此引人入胜,以至于这些叙事技巧几乎不被察觉(Keneally 2014)。

5 结束语

澳军战俘被日军奴役修建泰缅铁路的惨痛经历成为澳大利亚最具创伤性的民族体验之一,弗拉纳根紧紧抓住其记忆的核心,配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全面展现澳军军医救死扶伤的杰出品质及固有的人性弱点、澳军战俘在求生过程中的无私与自私、日本军人在战争背景下的人性兽性以及澳大利亚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激烈交锋和碰撞。弗拉纳根对战争的残酷书写令人心惊,对爱情的悲感叙述令人扼腕,对人性的深度拷问令人深思。在《曲径通北》中,人性的怯懦与顽强、残忍与柔情、丑恶与美好如同复调般展开,作家超越单纯的民族与道德层面,从战争本体出发,明确地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探究人性,并以人性的关怀和悲悯为基准来审视战争,使作品达到艺术的力度、人性的深度及人道的高度,忠实地履行严肃文学应有的使命。

参考文献

- 陈亚美.《布里尔小姐》中文学素描画的叙述功能[J].外语学刊,2015(4).
- 弗雷德·塞克.永远不能忘记:日本战俘营的岁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松尾芭蕉.松尾芭蕉散文[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 约翰·杰克斯.爱情与战争[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
- 张锦.以悲为美[J].外语学刊,2016(5).

- 张晓花.海明威“冰山原则”下的小说创作风格[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
- Beaumont, J. *Gull Force: Survival and Leadership in Captivity, 1941 - 1945* [M]. Sydney: Allen & Unwin, 1988.
- Beaumont, J. Prisoners of War in Australian National Memory [A]. In: Moore, B., Hatley-Broad, B. (Eds.), *Prisoners of War, Prisoners of Peace: Captivity, Homecoming and Memory in World War II* [C]. New York: Berg, 2005.
- Brown, M. Richard Flanagan Wins Man Booker Prize with “Timeless Depiction of War” [N]. *The Guardian*, 2014 - 10 - 15.
- Caruth, C.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Charles, R. Review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N]. *Washington Post*, 2014 - 08 - 19.
- Collett, A. Phantom Dwelling: A Discussion of Judith Wright’s “Late Style” [J].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2013(2).
- Donovan, S. Imperial Legacy [J]. *Nashuaak Review*, 2015 (1).
- Flanagan, R.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M]. Sydney: Vintage Books, 2014a.
- Flanagan, R. In My Father’s Footsteps on the Death Railway [N]. *The Sunday Times*, 2014b - 10 - 19.
- Header, R. Memory, Methodology, and Myth: Some of the Challenges of Writing Australian Prisoner of War History [J].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2007 (40).
- Keneally, T. Review of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N]. *The Guardian*, 2014 - 06 - 28.
- Masters, T. Man Booker Prize: Richard Flanagan Wins for Wartime Love Story [N]. *BBC News*, 2014 - 10 - 15.
- Romei, S. Man Booker Prize Winner Richard Flanagan’s Triumph Against Odds [N]. *The Australian*, 2014 - 10 - 16.
- Rose, R. Flanagan’s Homage to Father’s Wartime Struggle Wins Booker: Australian Novelist [N]. *Financial Times*, 2014 - 10 - 15.
- Twomey, C. POWs of the Japanese: Race and Trauma in Australia, 1970 - 2005 [J]. *Journal of War and Culture Studies*, 2014(3).

定稿日期:2016 - 12 - 16

【责任编辑 王松鹤】